

真正的知识超越国界*

——访当代社会学大师罗伯特·默顿 (Robert K. Merton)

阎 鸣

访问者：默顿博士，今天能够见到您，并向您请教社会学上的一些问题，我感到非常荣幸。前些天我在写给您的信中提到，希望从社会学的社会学角度进行这次访谈。所以首先想请您谈一下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学发展的看法。当然，这个题目很大。

默 顿：是啊。我想，可以公正地说，许多社会思想、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早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之前即已经奠定，这是社会学界有目共睹的。这的确很令人吃惊，想想看，我们已经接近20世纪末，而为当代社会学家所广为引用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却都是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确立的。像迪尔凯姆 (E. Durkheim)、韦伯 (M. Weber)、齐美尔 (G. Simmel) 以及美国舞台上的米德 (G. H. Mead)，均被系统地当作现代社会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本世纪社会学的发展大致如此。**我们所推进的是使总体理论不断地专门化，而最要要的成就，就是远远超过我们前辈所从事的高标准的经验研究。**附带说一句，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现在就座的这间办公室里，墙上挂着社会学创始人韦伯、迪尔凯姆、马克思 (K. Marx) 以及弗洛伊德 (S. Freud) 的画像。这并非简单地称，现代社会学思想体现了迪尔凯姆、韦伯、马克思、米德主张的变体，而是社会学已经开始具体地、高标准地确定社会现象的本质。**全新的理论观点不多，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仍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早期社会理论，并使之更为具体化。**应用社会科学方面有一些进展，尽管有限，可还是比本世纪初期所梦想的要广泛得多。你知道，从事社会学的人数大大增加，致使学科分化、专门化，而这就产生了我们所熟悉的派别问题，造成各专门领域里学者之间相互了解上的障碍。

访问者：您在做以上评述时，仅仅指美国社会学呢，还是一般社会学？包括欧洲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社会学吗？

默 顿：我在谈当代社会学，主要指西方社会学。即便是东欧严肃的社会学研究，也源于西方社会学。例如，波兰解放以前，社会学就很发达，在应用和扩展欧美社会学思想方面很先进。你知道，苏联社会学有一个时期非常不发达。我1960年去那里，是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访问苏联科学院的第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在这之前不久，苏联政治局宣称，除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确有一门学科社会学。

* 本刊特约采访稿。

我们得知他们正成立“具体社会学研究所”。我们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和塔什干，所到之处，总是被引见给某个新的“具体社会学研究所”的某位新所长。而直到最近，苏联社会学研究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这里我不包括“真正的东方”，就是因为语言障碍。我无法了解社会学在中国或日本的发展情况，尽管我多年前曾去日本访问过一段时间。

访问者：是这样。社会学界有个说法，说是美国社会学一直占主导地位，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默 顿：是的。首先是规模上的不同。美国社会学比欧洲社会学规模大得多，必然会多进行研究，多培养学生。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社会学占主导地位。但是如我所述，**欧洲社会学思想始终对社会学发展存有深远的影响。**

访问者：您30年代在哈佛大学学习社会学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了解社会学。如今美国几百所大学有社会学系。您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地位的变化有什么看法？

默 顿：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社会学在欧洲和美国兴起、发展，并未遭遇到文化上摧毁性的抵制和阻碍。当然，最艰难的是麦卡锡主义时期，在一个短时期内，系统的社会现实研究遭受怀疑，但社会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中断。二战后美国社会学实在是突飞猛进。有过短暂幻灭——公众对社会学的幻灭，即一种对社会学无知的想法，认为社会学可以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提供急功近利的解决办法。在某种程度上，一些社会学家为了给社会学争得一席之地而给公众造成了这种印象。如今社会学不但成为大学中，也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你听一下政治人物或其他知名人物的讲话，就能看出社会学在潜移默化中的应用，而这一点常常连讲话的人自己还不察觉。

访问者：您对这些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做了评述。您个人致力于社会学研究半个多世纪，涉猎领域甚广，对学科发展贡献很多。您能不能谈谈您自己的成就？

默 顿：当然啦，要评价自己在某个领域的成就，一定要承认，这些成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总要依赖于其他同行、同事，过去的、现在的都有。回顾自己50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我在创立现在叫作科学社会学方面起了一些作用。我30年代开始研究这个领域，那时这还是个未知领域，还没有人认真地形成一些思想，使之演进成一个拉卡托斯(I. Lakatos)含义上的研究项目。我认为我在理论上和研究课题上的努力已结出了硕果。除此之外，我比较用心的，是对社会结构和功能分析的毕生研究，这大大扩充了迪尔凯姆的研究，我还力图不断发展它，使之与经验研究相结合。长期以来假想的那种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互脱离是我自始反对的，而使两者结合则是我的贡献。

访问者：这就是您称之为“中观理论”的思想吧？

默 顿：是的。**我从不接受那种假定理论思想和经验调查相分离的观念。理论和经验研究任何一方缺少另一方都不可能有效地进行。**当然，社会学家们在理论上是赞同这一点的。“中观理论”的概念就是力图使这个想法更具体化，切实可行，从而提出一套系统的社会学观念。我既反对经验主义，也反对建立无法与经验研究相联系的抽象理论，两者均非有效之道。此外，我涉猎过一些专门领域，如医学教育、职业社会学、大众传播、宣传、官僚制以及局部和全局影响，最重要

的还是科学社会学。我觉得这些分支领域并不只需要各自独特的理论观点，一般理论构架也能够应用于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

访问者：您对社会学的这些贡献，使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说法——“泰山北斗”，我们用它来形容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人物。我觉得您当之无愧，您说呢？

默顿：有意思。在科学上以及某种程度的人文科学上，知识的影响可以说是阈下的(subliminal)，意即某个思想融入该学科的规范知识体系，而其出处却常常被遗忘。例如，“利他主义”这个词，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其实是孔德。我将这一知识演进和转化的方式，叫作吸收—消失模式，或者简称为OBI模式(Obliteration By Incorporation)，一种思想，一个方法，一项研究结果，被吸收作规范知识的一部分。例如，在社会科学领域和公共生活中，许多人提到“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然而却不知其出处，也不能期望他们知道这一概念术语，它是于194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自我实现预言》中首次提出的。这种融入规范知识的“消失”，正是科学家、学者生命中美好的时刻。因此，我们谈的知识影响，常常并非指“引证”某些具体材料的显在影响，而是知识累积和转化中的影响。

访问者：我非常同意您的这一看法。请问，您最近在做些什么研究工作呢？

默顿：(翻找资料，递给访问者)这是一本最近出版的评价我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工作的书，售价很高，由乔恩·克拉克(J. Clark)等编，题目是《罗伯特·默顿：合意与异议》。我最近在研究科学上的社会—认知模式的问题，即在科学知识的产生和转化过程中，社会和知识的结合方式。还有一本书《社会结构分析》，是我这些年讲课的讲稿，从未发表过。可以很容易地数出有9本书要完成，可是我很怀疑精力是否允许我有那么多时间。

访问者：您真是雄心勃勃啊！我看到两本关于您的传记，您打算写一本自传吗？

默顿：不会的，这是出于最佳的，也是最糟的理由。我从不写日记，也不记日志。我于个人经历的记忆断断续续，有些东西记得，但不连续、不详尽。一个不充满细节描述的自传算不上是自传。这使我想起约6年前，有位诺贝尔奖得主，德国小说家亨瑞驰·鲍尔(Henrich Böll)写的一本短而不全的自传。《纽约时报》的书评写道：我们无疑感谢鲍尔先生讲给我们的一切，可是我们真不愿意他花大量篇幅解释为什么他记不得这个或那个细节了。我不打算重复这一错误。

访问者：真有趣！那么，我能问您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问题吗？

默顿：你的意思是要暴露一下我的无知吧？我真的对中国所知甚少。

访问者：您去过中国吗？

默顿：没有。

访问者：您刚才提到您去过日本，能谈一下吗？

默顿：可以。我最后一次去日本是25年前，那是60年代初的事。夏天在京都大学，有差不多20个社会学助教参加在京都举办的暑期研讨班。日本社会学并未给我留下什么准确、清晰的印象，因为当时他们非常渴望了解美国社会学。结果，很遗憾，我没能了解什么。

访问者：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情况，我曾经寄给您两期我主编的《中国社会学重建十

周年，1979—1989》。19世纪末中国自西方引入社会学，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多留学欧美。他们之中目前最著名的是费孝通。不知您是否听说过他，他曾经是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学生。

默 顿：他是不是最近访问过美国？我想我可能见过他。你看，我记不起许多细节——甚至愉快的细节。

访问者：很凑巧，他也是1910年出生，与您同岁。

默 顿：好年轻啊！

访问者：您是说，他看上去很年轻？

默 顿：不，我们都¹很年轻！

访问者：中国社会学1949年以前非常西方化。1949年以后，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都留在了大陆。台湾社会学经历了一段停滞时期，60年代以后才重新获得发展。许多人来美国学习社会学。台湾社会学者们担心的问题是台湾社会学是否太美国化了。

默 顿：其实不必担心这种问题。这就有点儿象是说，本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太欧洲化了。若不考虑这种国家主义，而是把不同的发展置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中考虑，就不会担心这样或那样的情形。要关心的则是，一旦从其他文化中学习了自己文化中所没有形成过的思想，就要继续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思想方法，这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取得自治。你看多有意思，连社会学家也谈什么美国社会学、英国社会学、德国社会学等等，而他们总该超越这种狭隘的国界地方观念的吧。诚然，任何特定的社会，其内部文化凝聚力要比一系列不同国家社会之间的凝聚力强一些。但是，若担忧某些社会学思想的国家来源，那是不能打动我的。依我看，问题是现代中国社会学作为一个后来者，如何充分吸收已有知识——无论其在何处形成——从而能进行创造性研究并独立地发展。就是这样。

在社会学研究中关心国界的问题，就象在同一个国家里关心某个思想是源于坎布里奇^①，还是纽约或旧金山。这是最糟的一种地方主义。

访问者：可是民族特点、社会因素在一门学科发展中的确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由于政治的原因，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曾中断了27年。其间，历史唯物主义替代社会学，成了唯一真正的科学。直到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才得以恢复。类似的情况在苏联、东欧国家也发生过。

默 顿：然而我恰恰相信，真正的知识超越国界。某个思想在一处成立在另一处也应当成立。我不是那种相对主义者，认为在纽约是坚实可信的知识在北京或台北则不是。可信的知识是超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文化影响科学研究的方向，但若是可信的知识，就必须经得起统一的批判检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

无论是国家的还是更局限的地域文化会影响研究题目的选择，甚至影响思想方法。然而，我仍认为这并不能下结论说，社会学知识在一处适用而在另一处不适用。也许文化会造成阐述方式的不同，以及对研究成果有不同程度的兴趣，然而，若是可信的知识，在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中都是适用的。某种文化

① 即Cambridge，哈佛大学所在地。

中具地方特色的知识在另一种文化中不一定适用，可是那并不影响思想方法的效力。政府可以强制阻碍某些思想研究，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不是在谈政府在允许或禁止某些思想方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指相对主义的问题。极端的相对主义是自我毁灭的。

访问者：在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出：“国际社会学界所企待的，不仅是中国兴旺的国家社会学，更是一个蕴涵中华文化特质而能够对世界社会学有所贡献的中国社会学。”我认为我的这一看法与您上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但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如何达成这一目标？

默顿：**中观理论的思想就是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观察和阐释。**也许要研究某一具体社会现象，比如说，美国的。但是**自中观理论中产生的一般知识，不仅仅能应用于美国，经过调整后，也将应用于其他社会。这就是“真正的知识超越国界”的含义。**与此相关，在特定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观念，不是这一文化所独有的，而只是发达些而已。再说一遍，如果是经过扎实的研究程序、严密的批判评价，不同国家的社会学，是可以对世界社会学有所贡献的。基本上，中国社会学家的贡献尽管与英国、德国社会学家的有所不同，然而社会学知识的正确性并不受文化局限。

访问者：您能否谈一谈未来21世纪社会学的发展？

默顿：现在很难讨论这样的问题。

访问者：这篇访问记的读者将是广大的中国社会学工作者，您要对他们讲点儿什么吗？

默顿：过去及现在，我们期盼着社会学工作者世界性的合作，无论你们身处何方。简而言之，**全世界社会学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狭隘的地方主义的锁链。**

访问者：谢谢，默顿博士。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更感谢您对中国社会学者的激励。

1991年5月

访问后记

访问罗伯特·默顿，将他生动地介绍给中国社会学界的同行们，这是我久已渴望的。

对罗伯特·默顿这个名字，中国的社会学者并不陌生。早在30年代，默顿便以《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1938）一书（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开创了科学社会学这一研究领域，也为自己赢得了“科学社会学之父”的美誉。在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上，默顿提出“显在功能”、“潜在功能”、“反功能”、“结构—功能分析”等观念，与帕森斯一起，奠定了社会学中重要理论派别——结构功能主义。此外，默顿涉猎了职业社会学、犯罪、官僚制、医学教育、大众传播等等，对这些分支领域的基本建设，功不可没。而默顿所倡首的“中观理论”思想，他所强调的理论思想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则引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乃至当代世界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在社会学学科发展不断分化、专门化的今天，众多社会学者埋首于各自专攻的分支领域。我们似乎可以说，默顿承袭欧洲社会思想传统，可能是最后一位“经典”社会学大师了。

早在1990年春，我便通过默顿所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助教向他探询。默顿1941年

开始任教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目前是哥大的荣誉退休教授。据说,对于我的访问意向,老先生欣然应诺。我想,这并非是默顿对一个年轻的社会学学生有什么特别青睐,而是对她所来自的那个具有古老灿烂文化的东方大国心向往之并对其社会学的发展格外关切吧。反而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疲于应付繁重的学业和紧张而毫无保障的留学生活,访问的事一拖再拖。过了一年多,待我再次联系,才终于定下来。

1991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乘地铁来到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罗素·塞奇基金会(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大门口接待人员与默顿的秘书通过电话,说是我可以直接上到四楼默顿办公室。等电梯时我不无紧张地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采访,对象又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但愿一切顺利。

说也奇怪,当我的手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握住的时候,我的紧张不安感反而完全消失了。默顿高瘦而斯文,身材挺拔、目光炯炯,根本不像是个已届八旬的老人。我坐下来,环顾四周,注意到这间房不过6、7平方米,中央一张大写字台便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空间,桌上除一些书刊资料外还有一台电脑。墙上挂着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和弗洛伊德的画像。据说,默顿自年轻时起,便在自己的住处、办公室悬挂许多大学者的画像,意即自己“站在巨人肩膀上”,也将成为一位“巨人”。诚然,相比之下,他不如马克思,其思想使人类历史为之改观;也不如弗洛伊德,尽管受到非议,仍然冲击整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可是就社会学领域而言,默顿如同迪尔凯姆、韦伯、帕森斯,成为社会学尤其是现代社会学当之无愧的“泰斗”。

我们寒暄几句之后,便开始正式访谈。默顿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充满智慧。他一会儿高屋建瓴,大手笔勾勒社会学发展面貌;一会儿又中肯而极具洞察力地深刻反省、评价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我的大部分问题都是从社会学的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角度提出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角度设计问题,是考虑到:其一,默顿作为社会学大师,毕生从事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建设,他可以真正把握这门学科的关键和演变脉络;其二,社会学的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领域,除了在60、7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有过短暂发展以外,一直不大为社会学者所重视,而它却恰恰是笔者的兴趣所在和研究重点。在访问的后部分,针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笔者与默顿讨论了社会学的社会学中一个长久争论的问题,即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默顿长期从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一方面,他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发展之作用;另一方面,他深受自然科学影响,坚信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独立的知识体系。在这次访谈中,默顿格外强调后者,并提出“真正的知识超越国界”。大师鼓励中国社会学者,尽管是后来者,打破狭隘的地方观念,充分吸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形成的已有社会学知识,进而从事创造性研究,终究将会对世界社会学做出贡献。

访问结束后,我告别默顿,步出罗素·塞奇基金会大楼。走在曼哈顿宽阔气派的公园大道上,行色匆匆的人们不时从身边经过,我的脑海中充满了访问的全部过程和种种细节。但是回想起来,似乎最使我怦然心动、令我激动不已的还是默顿说的“我们都很年轻”。社会学这门学科,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依然年轻;中国社会学,历经曲折、沧桑,依然年轻。是啊,谁能说年轻不是活力所在,年轻不是希望所在呢?!

1992年1月2日于美国纽约

责任编辑:唐军